

骑兵军

孙越 译
〔苏联〕伊萨克·巴别尔 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〔苏联〕伊萨克·巴别尔著
孙越译

骑兵军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骑兵军 / (苏) 巴别尔著 ; 孙越译 .

—北京 : 文化发展出版社 , 2016.6

ISBN 978-7-5142-1321-8

I . ①骑… II . ①巴… ②孙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苏联

IV . ①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4163 号

骑兵军

著 者: (苏联) 伊萨克·巴别尔 (著) 孙越 (译)

出 版 人: 赵鹏飞

责任编辑: 肖贵平

执行编辑: 罗佐欧

责任校对: 岳智勇

责任印制: 孙晶莹

责任设计: 侯 铮

排版设计: 北京盟诺文化

封面设计: 大合视觉

图片提供: 卡秋莎画廊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 (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printhome.com www.keyin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6.75

印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 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321-8
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解读巴别尔（代译序）

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，认识了作家伊斯坎德尔（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）。他是苏联时期最著名的几位大作家之一，曾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副主席，对巴别尔（Исаак Бабель）的评价较高。他说，以巴别尔的才气和成就而论，可以排在契科夫（Антон Чехов）和蒲宁（Иван Бунин）之后，堪称现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的继承者。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评价。当然，认同巴别尔是文学大师的，不仅有伊斯坎德尔，还有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，如马雅可夫斯基（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）、亨利·巴比塞（Henri Barbusse）、别雷（Андрей Белый）、罗曼·罗兰（Romain Rolland）、富尔曼诺夫（Дмитрий Фурманов）和托马斯·曼（Thomas Mann），还有巴别尔同时代的很多苏俄作家，他们不仅是巴别尔的同行者，更是其文学成就的见证人。

巴别尔的小说《骑兵军》（《Конармия》），那个时代被称作短篇小说集，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，就是真实记录 20 世纪

人类的灾难，他不逃避现实，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，完美地作证，所以，他才是真正的作家。巴别尔曾说，作家在实际写作中，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题材。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，因为诚实，就要殉道。巴别尔于1920年出任《红色骑兵报》（《Красный кавалерист》）战地记者，笔名柳托夫（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）。1923年，他描写骑兵军生活的小说问世，遭到原红色骑兵军第一军长布琼尼的严厉训斥。布琼尼给《骑兵军》列出三大罪状：软弱、洁癖和诬陷。巴别尔说，布琼尼骂他的原因，是因为《骑兵军》写得“太诚实了”。后来幸亏有高尔基出面保护，巴别尔才幸免于政治灾难。

《骑兵军》虽以苏俄国内战争为背景，却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，概念化解读主人公。同期的另一作家法捷耶夫（Ал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）所写的《毁灭》（《Разгром》），其文学成就远远逊色于《骑兵军》。原因在于，《骑兵军》里没有将所谓新旧人道主义的对立，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德准则，未将知识分子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。作者借战地记者——主人公柳托夫之口，通过38个小故事，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。

巴别尔是语言大师，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，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，依旧独有，且后继无人，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，他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混杂和互动，即使对俄国读者，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，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，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。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，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，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，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。

《骑兵军》篇篇精彩，字字珠玑，本文篇幅所限，容我略举几例，权作赏析。且看本书首篇《渡过兹布鲁奇河》，开场即描述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白骨堆铺成的公路，此路不仅是从布列斯特到华沙，作者所指整个人类道路皆为死亡和鲜血铺就。进入第二段，情景愈加丰富，由远及近，笔触抒情而细腻，用修道院之静美暗示战争有违自然，破坏生活的和谐与安宁。巴别尔通过递进方式，先展开自然之美，再将人与景的心理疏离凸显其中，最终以“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，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”等意象展现人与景的对立。

作者除了描写色彩，还兼顾气味和声音，如血腥味和死马气味及河水浪涛阵阵等，“声”与“味”撞击着读者的心，小说开篇写得纯净而丰富。通过这个短故事，我们可感觉到巴别尔语言的另一特点：雍容华贵和突然迸发的穿透力。巴别尔灵巧地利用语言优势，在狭小的篇幅展现他的文学天赋，他在高尚之后是渺小、悲剧之后是滑稽，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为伍，诗情画意与自然主义并行，将欣喜与怀疑、快乐与悲伤相提并论。

《我的第一只鹅》是篇绝妙之文，它用简单的故事，回答了复杂的问题：为什么《骑兵军》的主人公要参加布尔什维克红军？答案很奇特，主人公柳托夫是诗人，他热爱自由，想发现和创造新世界，所以他参加了红军，孰料，革命却改变了诗人。柳托夫为融入革命战士的行列，宁愿放弃自我。巴别尔设计了柳托夫杀鹅的情节，将诗人内心的痛苦、纠结和矛盾展示给读者。在巴别尔的故事中，残酷的厮杀和无情的流血时刻在发生，主人公柳托夫置身于无知、愚昧和粗俗的红军哥萨克士兵中，环境逼迫他要尽快与战士们相结合，别无他路，最终他与战士们坐在一起喝汤，

并给他们读报纸上列宁的讲话，任凭那“杀生的鲜血所染红的心低声地哀号”。至此，巴别尔再一次将喜悦与痛苦，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完美地融合了。

《多尔古绍夫之死》将人道主义冲突推向高峰。柳托夫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，他理所当然反对暴力。报务员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膛，肠子流到膝盖上，连心脏的搏动都看得见。多尔古绍夫怕被波兰人抓后受辱，让柳托夫开枪将他杀死，柳托夫拒绝了，另一位红军战士阿丰卡·比达，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多尔古绍夫，并怒斥柳托夫虚伪，还差点杀了他。

法捷耶夫的小说《毁灭》也有类似的情节，他对此种牺牲的态度大加褒扬赞美，称之为“新人道主义”和善行。可见，巴别尔的态度与法捷耶夫截然相反。《多尔古绍夫之死》写的是传统价值观与“新人道主义”的激烈冲突。那么，巴别尔和法捷耶夫，谁更接近真正的人道主义？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问，至今没有答案。这时，小说笔锋一转，写道，车夫格里休克目睹了一切，却因此对柳托夫产生了好感，送给他“一个皱巴巴的苹果”，聊表敬意。这暖色的一笔，在人道主义争论之外，点染出人类情感的多样性。《多尔古绍夫之死》的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：“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，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。”巴别尔在其作品后来的几个版本中，删掉了这段，我觉得，他此举是想把人道主义的思考留给读者破题，留给历史公断。我想，《多尔古绍夫之死》的故事发生在反人道的背景之下，柳托夫怎可能会有人道主义的选择？

小说《基大利》表达的是生命的最高价值。作者在文中强调，革命就不可能不开枪。作者在字里行间讽刺和调侃了基大利们的

共产国际，实际上也在调侃自己的痛苦，正像他所写：“我在日托米尔城徘徊，寻找一颗胆怯的星星。”他对理想，犹如对这颗怯懦的星星，他自己也不确定，因为星光“时而闪耀，时而消失”，表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认识的不确定性。小说主人公一方面对革命欢欣鼓舞，另一方面又为革命所伤害。巴别尔又是在借柳托夫说自己，他渴望和向往自由，渴望看到旧世界毁灭，因为他是诗人，而诗人的心灵是敏感的，繁复而多样的，他不接受任何革命暴力，即使这是辩证的暴力。

《一封家信》是一篇重锤般的作品，直击读者心灵。男孩儿库尔久科夫给母亲写信，寒暄之后，便大谈马驹斯乔帕，用词情真意切，不看下文会错将马驹当人。笔锋陡然一转，描写父杀子、子弑父的过程。在男孩笔下，弑父和骂娘如家常便饭，一个小孩子，都对此见怪不怪了。但故事的精彩之处，还不在于亲人之间的杀戮，而在于未成年的小红军讲述时的冷漠与平淡无奇。在小男孩心中，父亲与兄长之死和马腿生疥疮无异，骨肉残杀与宰头小花猪等同，不过都是些生活琐事而已。

库尔久科夫的价值观很特殊，他觉得兄弟谢苗·季莫菲伊奇是最好的人，理由是“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，布琼尼同志下达命令，发给他两匹马，好军服、一挂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”，库尔久科夫深信，只要全心全意为苏维埃政权献身，未来要啥有啥，所以，谁碍了他的事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杀，亲爹老子也不例外，这种价值观支撑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，它貌似怪诞，却非常合理。

《一封家信》的写作手法，借用了俄罗斯民间口述文学的形式，向读者展现故事主人公丰富而独特的心理活动。小说的结尾，

是作者的点睛之笔——“在外省照相馆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背景墙下，戳着两个年轻人——身材奇大，一副蠢里蠢气，大长脸、凸眼珠，活像在挨训，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——费德尔和谢苗。”这既是对库尔久科夫家两兄弟形象的描述，也是为新生政权参与者存照：他们四肢发达，不学无术，却勇猛愚忠，擅长以革命名义滥施暴力，这条特性主线，贯穿全书所有主人公。但巴别尔并没有以历史名义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生来就没有被赋予道德感。

《寡妇》是巴别尔小说经典篇章之一，其结构的完美无与伦比。小说标题很调侃，别具讽刺意味，团长舍维廖夫处于弥留之际，马车夫廖夫卡却在一旁，大谈他当杂技演员和举重运动员的美好过去，生活中对犹太人的歧视，并当着舍维廖夫的面与他的情妇大行苟且之事。

故事通篇看不到对生的赞美和对死亡的尊重。舍维廖夫给萨什卡的遗言，就是把抢来的战利品留给她和母亲。团长舍维廖夫死后，萨什卡把他的遗嘱忘得精光，马车夫廖夫卡扯住萨什卡的头发，打得她满脸是血。巴别尔笔下这两个人物极令人厌恶，文末，作者将他们的形象推向了极致。

……

掩卷沉思，巴别尔的《骑兵军》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？我想，最重要的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。《骑兵军》告诉我们，俄罗斯数世纪的同室操戈和兄弟残杀，不仅仅使俄罗斯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，而且使其丧失了人道主义思想、道德和情感生长的土壤，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，只有无路的田野和旧国界。那么，未来到底在哪里？这只能由巴别尔自己来回答。而他，也确实回答过

了，只不过不是用小说，而是用他的生命。

1982年深秋，我的文学导师，文学翻译家石枕川先生，第一次对我提及苏联作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《骑兵军》。那时候，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们都不熟悉巴别尔，更不会翻译他的作品。石教授对巴别尔评价很高，那时，我读书的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巴别尔的俄文原版《骑兵军》，所以，我就听石教授口述巴别尔的人生和《骑兵军》的情节，对我而言，这不啻为高尚的文学享受。石教授见我对巴别尔神往就说，将来若有可能，你不妨翻译《骑兵军》。

1986年，我第一次读到《骑兵军》原文。我记得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的资料柜里，发现了《骑兵军》原文，它竟是一部复印件，而且肯定不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再版的《骑兵军》复印件，而是苏俄20年代初版的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就在我拟以复印件做蓝本，准备翻译《骑兵军》的时候，苏联开始再版巴别尔小说，这是苏联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，又一次重印巴别尔作品。看来，正如作家爱伦堡所说，人们对曾经震撼过他们的作品总是念念不忘。那年，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，意大利《欧洲人》杂志所评选出世界100位小说家，巴别尔名列第一。翌年，我开始动笔翻译巴别尔作品。1989年全书脱稿，1992年，经过翻译家王守仁先生亲自推荐，《骑兵军》收入范若丁先生主编的《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》。24年过去，文化发展出版社慧眼识珠，再版巴别尔的《骑兵军》，这毫无疑问，是对世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，也使我得以有机会重译巴别尔，并将我在十余年中，从敖德萨、尼古拉耶夫、基辅、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地，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，灌注于新译文，使之更

鲜活、更灵动和更具生命力。

我想在新译本面世之际，感谢已经远上天国的翻译家石枕川教授和陈铎教授，他们对我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，对我的译文曾予以批评和校正。感谢翻译家蓝英年教授数次专门回答我翻译中的疑难问题，并为我讲述巴别尔的生平与创作。感谢董曦阳先生和肖贵平女士对本书所做的策划、编辑等很多既具有创造性也很烦琐的工作。感谢在本书翻译和修改过程中，所有支持过我并为此付出的人。鄙人才疏学浅，谬误在所难免，敬请不吝赐教。

孙 越

2016 年春于北京

回忆巴别尔

[苏联]伊·爱伦堡

巴别尔的作品在经过长达 20 年的停版之后得以问世，使得对这位大作家的名字闻所未闻的青年一代，可以熟悉这几部 30 年前震撼过我们的书了。

巴别尔初期的一些尚不成熟的短篇小说，发表于 1916 年。阿·马·高尔基发现了她，高尔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都满怀爱心关注着他的创作之路。巴别尔广为人知稍晚，是在 1924 年，当时马雅可夫斯基在《列夫》杂志上发表了年轻作者的几个短篇小说。此后不久《骑兵军》问世。1926 年我与伊萨克·艾曼努依洛维奇相识时，他已经尝到了荣誉带来的苦头，在回避那些过于纠缠的崇拜者了。《骑兵军》被译成 20 种语言，巴别尔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。1928 年罗曼·罗兰曾写信向高尔基谈起他。1935 年巴别尔作为苏联代表之一，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。我记得，安利·巴比塞、亨利希·曼、让-利沙尔·布洛克、沃尔格·弗兰京都热情洋溢地会见了巴别尔。对于国内外读者来说，他是当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。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，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。他永远在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，

他与其他作者的区别，不仅仅在于独特的创作手法，而且在于对世界独特的理解。他是最准确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。不久前，我得到一本他1920年的日记——那时巴别尔在第一骑兵军里。年轻的作者在日记本上匆忙地写下了自己的战时印象。《骑兵军》里有个故事《基大利》，其中写了一个旧货商哲学家。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篇小说是浪漫主义的虚构，但日记解释了《基大利》的出处：1920年7月3日，巴别尔在日托米尔米城遇到了自己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并记录下来：“矮小的犹太哲学家。异乎寻常的小铺子——狄更斯，笄帚和金鞋子。他的哲学是：大家都说是在为真理而战，可大家都在抢劫。”

《骑兵军》里的另一篇小说是《军马储备主任》。其中巴别尔甚至没有改换主人公的姓氏。他在1920年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军马储备主任济亚科夫真是幅绝妙的画像，带银色镶边的红色制服裤，雕花腰带，斯塔夫罗波尔人，阿波罗般的身材，灰色的短髭，45岁……是个大力士……谈到马……”又过了三天写道：“济亚科夫来过。谈话简短：凭这马能得一万五千卢布，凭这匹能得二万，如果它站起来，那就是一匹马呀。”现在好像已把这种忠实地再现现实的作品叫“特写”。然而巴别尔的小说常常令我们惊诧不已，有时它们接近幻想小说。他发现了别人忽略的东西，用让人吃惊的声音谈论着。有一类作家总是拉开非凡的架势，描写平平淡淡的東西。还有一类作家，则愿意以平淡的口吻讲述非凡的故事。巴别尔简洁动人地展示出一个人漫长的一生，其中非凡总为平凡所冲淡，如同香精被水稀释，而悲剧性又为习以为常的事物所削弱。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，他独厚短篇小说。他似乎是用探照灯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小时，有时是一分

钟。他总是选择人类最为坦露的那些状态；也许正因为如此，爱的激情与死的主题才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执拗地反复出现。

他写作非常之慢，对自己十分苛求，他留下了三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和两个剧本。除少数例外，他的书都展示震撼过他的两个世界：革命前的敖德萨和第一骑兵军的军旅生活，他曾是骑兵军中的一员。

巴别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敖德萨度过的。他眷恋故乡，在革命前夜他写道：“敖德萨有人口众多、贫困和痛苦不堪的犹太人社区，有十分自负的资产阶级和非常黑暗的市杜马。敖德萨春天的夜晚甜蜜而令人困倦，金合欢芳香醉人，黑沉沉的天幕上高悬一轮充满宁静和神奇光辉的月亮……敖德萨有港口，港口里有来自纽卡斯特里、加的夫、马赛和赛伊达港的船，有黑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和美国人。敖德萨有过黄金时代，现在正处在富有诗意和带点漠然，又十分无可奈何的衰落时代。”

别尼亚·克里克，这个南方的暴徒、强盗和幻想家，走私贩子的女王柳勃卡·卡扎克，漫不经心和鼠目寸光的怪人和凶悍的骗子，说笑话的能手和想走好运的猎人，是不会诞生在文人的书房里的：他们包围着少年巴别尔。《我的鸽子窝的故事》起初只是一个小男孩的经历，后来，就是一个成熟睿智的大师在叙述了。

革命前，敖德萨被认为是笑话之乡。苏维埃时代为俄罗斯文学奉献了一批天才作家：巴别尔、巴格利茨基、伊里夫、彼得罗夫、卡达耶夫。鲜明、幽默、炽烈、厚重、浓烈的生活体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

《骑兵军》没有对革命的律师辩护，革命也并不需要这样的辩护。《骑兵军》的主人公们有时残忍，有时可笑；他们的身上

洋溢着充沛旺盛的、春潮般的活力。然而他们为之奋战献身的事业的正义性渗透在整部书中，尽管无论作者还是书中的主人公都不曾提及这一点。对巴别尔来说，《骑兵军》中的战士们，并非我们在当今文学作品中时常见到的那种公式化的主人公，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。如果说，20世纪有些作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，那么我们看到，一些森林妨碍苏联作家观察树木。《骑兵军》中有激流狂澜和暴风骤雨，同时，其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目、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语言。高尔基说过，巴别尔“美化”自己的主人公“比果戈理写查理波罗什人更好，更真实”。的确，很难无动于衷地阅读《盐》或者《多尔古绍夫之死》。

那种被老天主教徒们呼之为“肉欲的”、被现代清教徒们称作“兽性的”爱情，巴别尔坦然写来，全无虚伪的扭捏。丘特切夫曾提到的“阴暗朦胧的欲望之火”吸引着巴别尔，因为这种火光永远烛照着人类的本来面目，而不是他的面具。巴别尔对莫泊桑的喜爱不能归结为这位法国作者的创作风格。如果说到巴别尔与外国作家的相似，那更先令人想起20世纪20~30年代的美国作家：海明威、科尔杜埃尔、斯坦贝克。巴别尔像他们一样力求不去叙述一个人，而是展示他，像他们一样避免作者的议论而注重对话。然而，我多少知道，巴别尔对美国文学颇淡漠而是崇拜莫泊桑，并且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，与那些不如他那样喜欢莫泊桑的法国作家展开过热烈的争辩。他之所以看重莫泊桑，是因为莫泊桑展示了爱情的力量，他看重他的率真：“莫泊桑也许一无所知，也许知道一切：赤日炎炎的大道上驶着轰轰隆隆的驿车，驿车上坐着肥胖狡诈的小伙子波里特和一个结结实实、笨手笨脚的村姑。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与为什么干，那可是他们的事儿。

天热、地热。波里特和村姑大汗淋漓，而驿车在赤日炎炎的大道上轰轰隆隆地驶过。这就是一切。”

虽说巴别尔写过两个剧本，后来还写过长篇小说，但他首先是一个短篇小说大师。他在长篇小说泛滥、语言贬值的时代，更加害怕冗长，他善于用三两页写出似乎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。在他的短篇小说中，对话富于个性，色彩鲜明，因而有时一句话便能揭示一个人的内心面貌。

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光彩夺目，他像20世纪某些写生画家一样，寻求鲜明的色彩。他不怕出格，在小说《季·格拉索》中，他表露自己的艺术态度：小说描绘了一位西西里悲剧演员的表演，他藐视常规，令观众折服。早在1915年，巴别尔在初试创作时，就说要在文学中寻找太阳，寻找饱满的色彩。他赞叹果戈理的乌克兰小说，惋惜“彼得堡压倒了波尔塔瓦。阿卡季·阿卡季耶维奇谦虚而又咄咄逼人地排挤了格利茨科……”对于习惯于拘谨羞怯的俄国散文的人来说，巴别尔塑造的形象似乎显得稀奇古怪，如同热带的鸟儿一样。如果论及巴别尔夸张手法的文学家系，那么首先令人想到早期的果戈理。

20世纪30年代初，巴别尔的创作出现了转折：他开始寻找果戈理在乌克兰小说之后所走的道路。他常常说自己过于堆砌辞藻，滥用形象，需要最大限度的朴素。根据那篇佳作《石油》，我们可以猜到 he 随后所写作品的面貌。1916年，高尔基劝告初始写作的作家好好研究生活，巴别尔七年没有发表一个字，尽管他仍在写。这时，他重又陷入沉默；从1936年起，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作品，而他仍然勤耕不辍。他一如既往，对自己十分苛求。他在写长篇和新的短篇小说。

巴别尔死于1941年，享年47岁。

他身材不高，墩墩实实，总是戴一副眼镜，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，时而忧郁的光芒。他身上那种对生活非凡的兴趣令人震惊，他为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的事物所吸引。他广交朋友，三教九流都有。他十分难得结交职业作家。他能整点钟地听别人的爱情、走运或倒霉的故事。他喜欢跳跃、奔跑，从马匹旁边经过绝对不会无动于衷。他写自己的战友赫列勃尼科夫：“……我们受到同样情欲的震撼。我们俩把世界看成五月的草地，看成了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草地。”

他谙熟多种外语，够得上一个大学问家，但对他来说，任何时候书本也不会盖过鲜活的生活。1935年，我在报上描绘过巴别尔在巴黎笔会上的发言：“巴别尔不讲本国语，他法语讲得流畅自如又老练，15分钟里他用几个没登过的故事令听众大为开怀。人们笑着，同时明白了，借这些快活的故事说出了我们的人和我们文化的实质：‘这个集体农庄庄员有了粮食、有了房屋，他甚至还有了勋章，但这对他还嫌少，他现在希望诗歌能写写他……’”

巴别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，可惜的是，没人把他讲的故事记录下来。1938年冬天，在莫斯科时，他常上我家来侃侃而谈；我当时曾想，他能很好地把一切都写下来。命运却另有安排。

他喜欢离群索居，喜欢“愚弄”人。他的生活有时令人想起鼯鼠的行踪。他闭门不出是为了能安静地写作。他在巴黎近郊住过几个月，在一个法国老妇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，这位房东把他当成了凶犯，别尼亚·克里克的同胞兄弟，到了夜里就像对囚犯一样把他锁在屋里，免得他把她杀了。这件事令巴别尔发笑，但